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学号: 27720060153434

UDC _____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三篇论文

Three Essays on Labor Economics

周 波

指导教师姓名: 洪 永 森 教授

专业名称: 西 方 经 济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1 年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1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1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1 年 月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摘要

本博士学位论文围绕中国的学费改革、代际收入流动性以及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估计了学费改革对入学率的影响，第二章估计了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三章估计了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第一章估计了2000年到2006年之间实施的三项学费改革政策对中国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影响。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我们的实证分析发现，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一费制”政策对入学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但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促进了农村女孩入学率的提高；自2006年开始实行的“免学杂费”政策对于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在四倍绝对贫困线以上的孩子的入学率的有统计上显著的正面影响。

第二章关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同样使用了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通过父亲的三期平均收入对儿子最近一期收入进行回归，我们发现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不低于0.51。该估计结果较北欧福利国家为高，而与英美的水平相似。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农村父子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城市父子代际收入流动性为高。

第三章研究了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关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这章使用了县级财政支出数据和来自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个人数据。与之前的研究应用线性模型考察该影响不同，第三章应用半参数部分线性变系数模型（semiparametric partially linear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来估计该影响，避免了模型误设问题。在线性模型中，我们未能发现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弹性存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的证据；在半参数部分线性变系数模型中，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和文教科卫支出的增加能降低代际收入弹性，有助于机会均等的实现，而预算内地方财政支出对此影响很小。

关键词：学费，入学率，代际收入流动性，公共（教育）支出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hree essays as following:

In the first chapter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n school enrollment of three sequential reforms undertaken between 2000 and 2006 on tuition of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for poor,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es and sample children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2000, 2004 and 2006 waves, we find that tuition control has had little effect on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enrollment. Furthermore, a policy that includes tuition waiver, free textbooks and living expense subsidies for children who live in rural, poor families starting from 2003 had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chool enrollment of rural girls. Finally, the provision of tuition waivers for all rural children since 2006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chool enrollment of children from relative rich families.

Many studie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have shown that Gini Coefficient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A further issue, which cannot be revealed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nge in Gini coefficient, is the long run impact of this income inequality o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To expose this long run asp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the second chapter uses intergenerational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to identify the father-son'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in China. To reduce the errors-in-variables bias, we perform OLS regression on son's most current income with father's average income over years. The resulted estimates are 0.51, which implies that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come inequality may pass down over generations and hence has a long run impact on the whol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hildren will increase the children's permanent income. Rich parent invest more in their children and then this leads to the correlation of parents' permanent income and children's permanent income, i.e. the positive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Public expenditures, especially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may improv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ies, reduc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gap between the children from rich families and poor families, and then affec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order to avoid model misspecification when using linear model, the third chapter uses semiparametric partially linear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estimate the effect of fiscal education expenditures on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We find that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public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and health expenditures at the county-level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and then improves equal opportunity while the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does not.

Key Words: tuition reform, school enrollment rat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iscal education expenditure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学费改革对入学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1
1.1 引言	1
1.2 数据	4
1.3 经验研究策略和估计结果	8
1.4 结论	18
第二章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21
2.1 引言	21
2.2 文献综述	23
2.3 计量模型	24
2.4 数据描述	27
2.5 估计结果	32
2.6 稳健性	41
2.7 结论	42
第三章 公共(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半参数部分线性变系数模型的分析	45
3.1 引言	45

3.2 文献综述	47
3.3 计量模型及其估计.....	49
3.4 数据描述	52
3.5 估计结果	56
3.6 结论	67
参考文献	69
附录 A 第一章附录.....	75
A.1 备择模型设定	75
A.2 基于logit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	76
附录 B 第二章附录.....	83
B.1 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83
B.2 证明	84
附录 C 第三章附录.....	85
C.1 数据	85
致谢	87

第一章 学费改革对入学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1.1 引言

本章考察了三项学费改革的影响，这一系列改革旨在减轻中国贫困家庭小学和初中阶段受教育的经济负担，主要包括“一费制”、“两免一补”（即免学杂费，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和生活补助）和免除其它农村家庭孩子的学杂费（为行文方便起见，下文简称为“免学杂费”）。我们利用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估计了这些政策是否促进了目标群体的入学率。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压力依然是决定能否接受包括小学和初中在内的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Brown和Park, 2002; Zhao和Glewwe, 2010）。^① 例如，2003年农村地区的小学生每人每年学杂费占人均家庭收入的2.1%到9.1%，相应的初中生的人均年学杂费占人均家庭收入的3.5%到14.8%。^② 因此，尽管中央政府规定所有孩子都应当接受至少九年的学校教育，但是相对比较穷的内陆省份初中入学率依然比较低。例如，尽管2000年中国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9%，但是仅有95%的小毕业生升入初中，而贵州省小学升学率竟然仅仅达到78.7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另外，2000年初中辍学率高达9.9%（中国教育年鉴，2002）。

确保所有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教育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在2001年到2006年期间连续实施了三项改革以降低农村家庭的受教育经济负担。2001年，教育部规定农村小学生学杂费生均不能超过每年120元，初中生每人每年不能超过230元。^③ 这一政策，即“一费制”开始主要在贫困县试行，到2005年春天在全国农村地区得到普遍实施。^④

2003年，辽宁省率先在其农村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即对农村贫困人口中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免收杂费、课本费和校内服务性收费（包括住宿费）。^⑤ 到2006年

^① 尽管中国在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孩子都应当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这一法律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仍需缴纳一定的费用，有的地区称之为学杂费，有的地区称之为杂费。不管具体名称如何，这些缴纳的费用与学费并无实质差异。

^② 该比率由作者自己计算得到，学杂费来自2002年教育部制定“一费制”政策时所规定的学杂费的上下限；各省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则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个人数据。我们分别以学杂费的下限和上限除以各省农村人均家庭收入，从而对于各省而言都存在该比例的两个数值，较低的数值对应下限，较高的数值对应上限。各个年份的该上下限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其所规定的学杂费水平呈上升趋势。根据《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2002年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试行工作的通知（教电[2002]53号）》，2002年农村小学生学杂费生均不能超过每年160元，初中生每人每年不能超过260元。学校实际收取的学杂费可以按教育部规定的水平上下浮动20%。

^③ 详见《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坚决落实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试行“一费制”收费制度的通知（计价格（2001）2477号）》。

^④ “一费制”所规定的学杂费标准后来有所变动，各地区不尽一致。

^⑤ 政府首先决定各地级市可以获得的“两免一补”的学生名额，然后层层分解到各个学校。各小学和初中学校的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可以获得该名额。一般而言，老师对其学生家庭的经济

春天，针对贫困生的“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得到推广。^①“两免一补”的核心部分在于免收杂费，免收杂费的覆盖群体远远大于免收课本费的覆盖群体，而得到生活补助的寄宿生的比例则更小，因此为行文方便起见，本章称这三项改革均为对于学杂费的改革。

自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政府规定西部地区的所有农村小学、初中学生免缴学杂费、课本费，贫困寄宿生可以获得生活补助（以下简称“免学杂费”政策）。江苏和辽宁以及两个中部城市在2006年秋季学期开始之前由当地政府实施了该政策。

这些改革非常重要。使用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的数据，我们估计2001年受这些政策潜在影响的儿童达到2.16亿。^②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实施这些政策究竟投入了多少资金，但是2007年2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报道，2006年仅在西部地区为实施这些政策就投入了361亿元。然而，迄今为止，人们仍不清楚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本章力图估计这些政策对目标群体入学率的影响。^③

我们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估计了这些改革的影响。改革的顺序通常是首先实行“一费制”，其次执行“两免一补”，最后是“免学杂费”。^④一般而言，这些改革始于国家级贫困县、省（自治区）级贫困县，然后推广到其它县和城市。^⑤因此，我们得以利用这三项学费改革在不同县之间实施时间的差异来估计其对入学率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这在农村地区尤甚。可以预见的是，当农村家庭面临经济困难而不能送所有的孩子去上学时，父母更可能牺牲女儿的受教育机会以便让儿子上学。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学费改革如果真能提高入学率的话，那么它们对女孩的影响应该更大些。故我们也检验了这些学费改革政策是否使女孩受益更多些。

在评估这些政策效果时，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当我们使用个人数据估计政策效果时，一个担忧是居住在控制组（control group）的人可能为了获得改革带来的好处而迁移到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如果这种担忧成为事实，那么我们运用倍差法将高估政策影响。基于两个状况还是有所了解的，能够较好将“两免一补”的名额分配给贫困学生。

^① 之后推广的“两免一补”为免收杂费、课本费，为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② 这一估计数值是按2000年中国大陆5周岁到14周岁的人数来计算的。按同样的方法计算，该数值在2006年下降到1.62亿。2000年的数据来自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006年的数据来自2006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7）。

^③ 在此期间小学和初中也经历了其它改革，如2000年到2004年学校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而非乡镇预算。由于这一改革在全国得到普遍实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年份和地区的哑变量来控制其可能的影响。

^④ 唯一的例外是辽宁省，该省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在“一费制”政策之前。

^⑤ Ravallion和Chen（2007）指出，从1980年到2001年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进展不同，而且同一时期内各省（自治区）的反贫困工作取得的成就也存在较大差异。本章所研究的关于学杂费和生活补助的改革也例外。

理由，我们认为这种担忧并不成立。首先，率先实施改革的地区往往教育质量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低也是选择这些地区先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父母不大可能为了获得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子女受教育成本降低的好处而迁移到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其次，即便父母有因为改革而让孩子转学的意愿，由于中小学入学都是基于户口，^①所以转学，特别是跨县的转学是很困难的。

其二，当地方政府依据上一年的在校学生数对学校给予补偿时，校方可能存在故意高报入学情况的激励。由于我们所使用数据的问卷中是由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回答是否在校学习，而且“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与学费改革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所以我们的研究不存在校方、家长或学生由于受到某种激励而故意误报入学率的问题。

其三，对于学校和适龄儿童的父母而言，这些改革的具体开始时间往往是不可预期的。^②

基于以上理由，用倍差法来估计这三项政策的效果是合适的。

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04和2006年共三期的调查数据。我们并没有发现“一费制”对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存在显著影响。不过，“两免一补”对该阶段的孩子的入学率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该影响对女孩更大些。“免学杂费”政策对仅对女孩的入学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三个关于识别假设的补充分析增加了我们对于倍差法使用合理性的信心。首先，当我们用高中年龄段的样本估计同样的模型时，所有政策效果都是统计上不显著的。其次，利用来自1997年和2000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我们进行了改革前检验（pre-reform test），同样没有发现对入学率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最后，用低收入的子样本估计“两免一补”的政策效果，同时用高收入的子样本估计“免学杂费”的政策效果，我们得到了类似的估计结果。

本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描述了使用的数据；第三部分，我们讨论了经验策略，报告了经验结果，检验了识别假设，给出了备择模型设定的估计

^① 在本章所研究的时期，入学一般都基于本地户口。最近几年农民工子女入学在政策上有改变，这对本章的结论不会有影响。

^② 一般而言，政策变化只有在实行前的几个月才会被公开讨论或者宣布。例如，苏州市于2005年9月9日在全国率先宣布将从2006年秋季学期开始对苏州市的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这则消息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和热烈讨论（见《人民日报》2005年9月12日第11版和《上海证券报》2006年2月23日），不少人甚至认为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在中国是否超前了。实际上，到2006年秋季学期开始时，许多省份在农村地区推行了免除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政策。故对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所访问的2000和2004年的人而言，免学杂费的改革是意料之外的。当“免学杂费”政策在某些县市开始实施时，某些居住在尚未实施这一政策的县市的父母可能会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免学杂费”政策也将在其所在县市实施。我们并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如果这一可能性确实存在，那么它将影响这些父母对其子女的入学决策。但是其对我们所估计的政策效果的影响是使估计值出现向零的偏误。至于“一费制”和“两免一补”，我们没有发现在2000年时出现过任何关于它们的讨论。这也就是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年的受访者没有预期到这两项改革。同理，2004年没有接受“一费制”和“两免一补”的人们可能预期到这两项政策会在不久的将来使其受惠。如果这一预期成立，那么我们所估计的这两项政策的效果会小于实际效果。

结果；最后是结论部分。

1.2 数据

本章所利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简称CHNS）2000、2004和2006年三期的农村样本。该调查项目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合作设计和实施的，本章所用的三期数据覆盖了九个省和自治区的54个县和市区，九个省和自治区包括广西、贵州、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和山东。^①在检验识别假设时，我们还用到了来自1997年那一期的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年的数据未涵盖辽宁省。该调查在每个省（自治区）选取两个市区和四个县进行调查，两个市区一般包括省会城市和一个低收入的城市，不过在两个省是调查了另一个大城市而非省会城市；四个县是根据收入分层之后随机选取的。在城市中选取城区的居委会和郊区的村或居委会，在县中选取县城以及其余地区的农村。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调查一般在当年的八月到十二月之间进行。本章使用了一个孩子是否经历了某一特定改革的哑变量，该哑变量可以通过比较问卷调查日期和每一县和市区的政策执行时间来生成。某一个政策在某县和市区的执行时间以该政策在该县的正式执行细则文件发出时间或者在该县和市区的主要报纸或网站公布时间为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要从改革中受益必须等到各个学校真正开始执行改革政策。不过，政策从中央或省一级传达到地方具体执行之间往往间隔了一段时间，这一时间从两三个月到大半年不等，对于这一间隔时间的长短，普通群众并不容易预期。从县或市区的具体执行细则或地方主要媒体报道将在该县或市区实施改革到各个学校实行该政策之间的时间就很短了，普通群众对此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们选取某一政策的县或市区级正式执行细则文件发出时间或者在该县和市区的主要报纸或网站公布时间为准。另外，针对政策公布时间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前，而县和市区级具体执行文件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后的情况，我们还以省级文件发出日期为作为政策执行时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估计的政策效果明显变小，而且一旦排除来自这种跨越秋季学期开学时间的县和市区的样本，估计得到的政策效果与我们本章报告的政策效果相似。这也说明了我们的选取该政策执行时间的合理性。

这些学费政策改革着眼于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考虑到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将城市的初中和小学适龄儿童作为控制组可能并不合适，因此我们专注于农业户口的初中和小学适龄儿童。另外，由于农村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他们更可能从这些政策中受益。故本章的全样本是“中国健康与营养

^① 本博士论文三章均使用了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该数据包括了东中西部以及南方和北方的不同省份，同时在省内选取样本时都力求使其具有代表性。因此尽管该微观调查数据仅覆盖了九个省和自治区的五十四个县（市），我在文中依然以中国或我国来称呼，该称谓也和使用该数据的其它文献保持一致。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